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在俄罗斯汉学中的地位 and 影响¹

张冰²

[摘要]:著名俄国汉学家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不但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第一部用外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这部文学史纲要自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俄国汉学界中国文学史撰写领域里的一部奠基之作。但王西里在此书中所秉持的文学(史)观与今日中俄两国知识界所秉持的文学(史)观截然不同。王西里所谓的“文学”在其书中绝大多数场合下,其实与“文献”同义,而其所探讨的多数主题,则大致属于“文化”范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王西里从事研究和写作的那个时代,中国的“文学”还主要指一种高雅的书面语体文学。其二,王西里所秉持的文学(史)观,带有19世纪的特点,即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甚至是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的一部分。在此认知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便不得不屈居一隅。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尽管有如此这般的“缺点”,但瑕不掩瑜,作为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用外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此书在许多方面都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具有奠基意义的开山之作,对于俄国汉学界在20世纪的诸多后学,仍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典范意义。本文即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书的内容作出合乎实际的评述。

[关键词]:王西里 文学史 纲要 评述

一、

在俄国,第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论著,出自 В.П. Василиев (中文名:王西里)之手。这部著作的全称为: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М.М. Стасюлевича, Восс. Остр. 21.7, 1880)*。2015年,在圣彼得堡和南开大学中俄两国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本由王西里原著、阎国栋教授汉译的双语版《中国文学史纲要》终于问世,满足了世界汉学界同仁们的翘首期盼。该书全名为: В.П. Василие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3 г)*; 王西里: *中国文学史纲要*, 圣彼得堡, 2013。该书封面一句“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专论”即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此书的价值。出版者更在扉页以精炼的语言介绍了该书的内容:“本书是王西里院士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的再版。该书问世于1880年,是当时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王西里院士的大胆假设和推论,即便在今天

¹ 本文系方维规主持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86,立项时间:2014年11月5日)的子课题“俄国早期中国文学史纂及其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² 【作者简介】:张冰,男,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也仍可以打开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片全新的天空。同时，它也是世界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中国汉学界来说，由阎国栋教授以注释形式译成汉语，极大方便了学者对这部著作的研读。下面，笔者拟从若干分题着手，对王西里此著的基本内容做一些介绍和评述。

王西里是俄国汉学从僧侣转入世俗的关头，伴随着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成立（1855）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建立（1899）而崛起的学院派汉学中第一批汉学家之一。³王西里原名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中学毕业后考入喀山大学语文系东方班，主修蒙语和鞑靼语。期间，还向蒙古喇嘛学习口语，兼修藏语。1837年以《论佛教的哲学基础》为题通过用蒙文写作的学士论文答辩后，留校工作。同年开始选修汉语。1839年以《论佛教的哲学原理》为题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当时的《祖国纪事》杂志曾发表题为《第一个蒙古语硕士》的文章，对其通过答辩一事加以宣传。随后又获得鞑靼语硕士学位。1839年决定创办藏语教研室的喀山大学，派王西里赴中国学习。同年11月，王西里随第12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赴北京学习藏语、汉语和梵文。王西里于1840年到北京，开始广泛涉猎中国、印度以及藏传佛教典籍，研究汉学问题并收集有关资料，使其汉学研究视野得到进一步扩大。阔别祖国10年后的王西里，于1850年返回俄国后，先是主持喀山大学汉满语教研室。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部更名为东方语言系，并把喀山大学东方学专业与之合并，王西里也随即转入圣彼得堡工作。王西里从此终生执教于圣彼得堡大学，在教学和科研领域硕果累累，成就辉煌，成为世界知名的大汉学家。1864年，王西里顺利通过了以《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为题的论文答辩，从而成为俄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东方语言博士。1886年，他被遴选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王西里在俄国汉学史上，是继比丘林之后又一位大师，也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精通汉语、满语、蒙古语、鞑靼语、梵文、藏语、突厥语等东方语言。他对中国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宗教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留下了卷帙浩繁内容广博的著作。

《中国文学史纲要》共十四章，其中涉及“纯”文学的，仅十三、十四章，以及第四章的一部分（《诗经》）。其余各章（除第一章为近乎于导论的“开篇简论”外，第二、第三、第四（部分）、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所涉及的内容，严格地说，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而毋宁说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中国文学史纲要》，确切地说是“中国文献史纲要”，所反映的，是近现代意义上文学尚未从文献中分化出来时的含义。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义偏差呢？

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在王西里著书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尚未发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文化还保持着封建时代的旧貌未变。促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比之更早的“小说界革命”，尚未问世。因此，我们不能站在今人的立场上“逆推”或“回溯”，用今天的逻辑来衡量昔日的文化。其二，在19世纪（王西里亦属之）人眼里，文学

³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96页。

是包孕在文化的母腹中的。力求使文学挣脱文化的怀抱，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也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王西里以一个异域人的身份，深入中国腹地进行考察，最先扑入其视野的，当然首先是令他感到新奇的中国文化及其东方色彩。换言之，他只有先“探骊”方能“取珠”。因此，对于王西里这样的“方外之人”，首先要花费大量脑力以克服和征服语言的壁垒，正是不言而喻的必要前提。

二、

诗经研究在王西里这部纲要里占有很大篇幅。这首先是由《诗经》在我国诗史中的地位决定的。众所周知，《诗经》系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教育的教科书。《诗经》产生于春秋中叶（公元6世纪），收录了从西周初期（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305篇诗。这305篇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都是乐歌。据传《诗经》也曾遭秦火之劫，后人凭记忆复述，才得以保存至今。孔子只称“诗三百”（《论语·为政》）。尊诗为经，是汉代才有的说法。《诗经》的编者，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朱熹的说法，系孔子。

在王西里的这部纲要里，《诗经》的介绍占有很大分量。但值得注意的是，王西里是把《诗经》、《春秋》、《论语》“作为三部最古老的儒家文献”，放在第四章“孔子及其实际贡献”中加以介绍的。他把《诗经》与《春秋》、《论语》等量齐观，是因为它们都“出自”孔子之手，而且，《诗经》更是“中国精神发展的基础”。可以断定《诗经》写定肯定在孔子之前，而把孔子当作儒家创始人则是汉代董仲舒时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开始的。把《诗经》列为儒家经典的唯一理由，是传说孔子生前曾经编辑过这部书。

正因为王西里是所谓“化外之民”，所以，不必唯中华民族文化图腾是认。从这个角度看，他对汉代以来把《诗经》儒家化的做法，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么，孔子的贡献到底是什么？要知道他所传下来的著作只是一个抄写员的劳动成果，因为没有人说过这些书是他撰写的。”⁴接下来，王西里评述了有关孔子与《诗经》关系问题在争论中出现的两种观点。一说孔子只做了字、词和词序的删改。二说孔子不敢擅自删改呈交给周王朝以体察民情的歌谣。王西里的结论是：“对于《诗经》而言，孔子如果不是一个简单的誊抄者的话，那最多也只不过是一个多次加工者而已。”⁵那么，孔子和《诗经》的儒学化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王西里认为：“是孔夫子第一个从前人那里和政府档案中获得了写作的技能，对其加以完善之后又将这一切传授给了民众”。这里有两点需要辨析。其一是孔子教人学诗，自己肯定也会，不必非得从《诗经》中学。第二，孔子所传授之人，先是“三千弟子”，然后经由他们，才传及士大夫阶层即知识分子。

⁴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59页。

⁵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62页。此处文字据原文略有改动。

如上所述,《诗经》按朱熹的说法,周公制礼作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邻国。《诗经》之所以被尊为中国诗歌鼻祖,是因为她为我国嗣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体裁和题材的基础和原型。对此,王西里也有比较切合实际的评述。他认为《诗经》显示了中国人民本土的创作才能,说明中国人民也同样拥有激情和嗜好,同样坦白真诚,感情真挚。《诗经》里有“情歌,有希望出嫁的少女之歌,有迷恋美人的情郎之歌,有情人约会,也有弃妇哀怨,还有夫妇、情人和亲人的离别之诉。”

6

《诗经》风、雅、颂里,王西里比较重视的是《国风》,而于《雅》,则只概述了大意而已。在《纲要》里,王西里介绍了120首诗,全部出自国风。每首诗只做节译,附原标题,但王西里又根据内容,按照自己的理解,打乱原诗的顺序,重新拟题归类。这120首国风,被分为“婚歌”(Песни свадебные)、“情歌”(Любовные)(其中包括 a、女子情歌(женские); 二⁷、男子情歌(Мужские); в、戏谑嘲讽之歌(Нашмешливые); г、阿那克里翁⁸之歌(Анакреонтические); д、哀怨惆怅之歌(Жалобные); е、官事官吏之歌(Служебные-чиновничьи); ж、谋取生计之歌(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以上共分七类)。但王西里自承:自己“丝毫不敢保证对所有诗歌进行了准确无误的归类”,因为许多诗歌呈现出混合特征。⁹《诗经》在俄国的翻译始于1852年,大多是从法文或英文转译。王西里所译120首,于1882年出版过一个单行本(时在“纲要”出版之后2年)。当今俄罗斯最为流行的全文俄译本《诗经》,由施图金(А. Штукин, 1904-1963)翻译。1957年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¹⁰显然,王西里在写作《纲要》时,并不想让“翻译”成为讨论的主题,而这也同样是我们的取向。

三、

关于《诗经》,王西里在其《纲要》里,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诗经》与孔子的关系,即在《诗经》的传播过程中孔子所扮演的究竟是怎样的角色?是编者抑或某种意义上的合作者?二是《诗经》注疏家所做注疏的可信度问题。即采取执笔者自己的“大胆解读”,还是处处以注疏为依归?第三个问题在王西里笔下尚未予以清晰表述,此文作者认为可以从概括抽绎而来,即儒家学说(或云意识形态亦然)是否对这部经典的阐释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一个问题前文已有所涉及。但不想下文王西里偏又旧话重提,可见对其是多么耿耿于怀。问题的症结在于:《诗三百》究竟是如何以及由何人收集而来,“是发生在孔子之前,还

⁶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65页。

⁷ 按:此处似应为6。

⁸ 阿那克里翁(约公元前570爱奥尼亚的特奥斯-约公元前480)希腊亚洲部分最后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他的诗作现存仅存片断,多为歌颂爱情、美酒和狂欢的诗句。他的观感和风格广被模仿,诗体中的“阿那克里翁风格”即以其名命名。

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07页。

¹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了一套汉俄对照本《诗经》(ШИЦЗИН),程俊英、蒋见元今译,(俄罗斯)施图金俄译,郑海凌审译。

是孔子亲自所为”？¹¹看来，对于周王朝设专门部门和官吏收集各国歌谣的制度，王西里始终心怀疑窦。“如果孔子没有在周朝找到《诗经》，那他是用什么办法获得了他从未去过的那些地区的诗歌？”¹²和先前一样，王西里再次重申了他的结论：“在所有文人出现之前，这些典籍就被以民间语言创作出来了。在荷马之前希腊人就会唱歌了，像中国人一样古板的埃及人同样在修建其金字塔以前就已经会咏歌了，而印度人在《吠陀经》出现前也会吟唱了。”¹³总之，王西里对《诗经》经秦火之焚以后依然可以经文人记忆恢复一点心存疑窦。显然，王西里也已认识到：在对《诗经》的解读和阐释中，前人的注疏起着极大的作用。

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诗经》，是汉朝一位叫毛萇的人的注释本。传说中的鲁诗和韩诗都未能流传下来。“毛萇被看做是最好的讲诗者和注诗者。”¹⁴一方面，在对《诗经》的解读中，我们不能不从这位首屈一指的注疏家出发寻绎诗经文本的原义；另一方面，也应对毛萇站在意识形态立场上对《诗经》文本所做的“曲解”、“歪解”提高警觉。儒家在汉朝被奉为官学之后，便被极大地“泛政治化”和“泛儒学化”了。当年的毛萇在注疏时，也不能不带着彼时意识形态这副有色眼镜。王西里指出：“汉朝的儒学为了控制政府，从一种民主和革新的学说变成了一种随遇而安和俯首帖耳的学说。《诗经》又怎么能独善其身！这样一种为专制帝王，事实上也为儒家统治提供广阔空间的文本怎能不受到欢迎？”¹⁵

这副“有色”眼镜难免会对字、词的识读也发生影响。在其影响之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不是恋人心语，而成了忠于王事的官吏不愿背弃君主之誓词（《王风·采葛》）。“佩玖”竟然成了“光辉道路”的意思！（《王风·丘中有麻》）。在这个问题上，王西里表现了一个域外学者“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在他看来，是不唯‘洋’，而唯实是求。他认为一个追求真相的学者，要敢于采取自己的视角思考问题，而不是唯中国人的注释是信。他首先举出朱熹反驳毛萇“诗大序”的例子，告诫我们：“任何注疏都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还很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¹⁶这一点事实上中国学者也不乏见解敏锐者：“《诗经》是经过沙滤作用而与政治结了不解之缘的”。¹⁷

可以说，《毛诗序》在为我们照亮了长远时代的同时，在处理具体文本中字词的解釋、文本的解读方面，也颇有“过度阐释”之嫌，以致指鹿为马。除了王西里指出的以上两首外，其实，类似而又比之更加严重的问题，还所在多有。如著名的爱情诗《关雎》，按王西里的解读，应该就是表现了人民感情上的天真质朴了吧，可按照毛萇的题解，则此诗述“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也，用之邦国也”。

值得注意的是，王西里作为一个“域”外中华文化学者，其之所以能“见人所未见”、破“局内人”之感，除了他的边缘文化人身份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在《诗经》解

¹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09页。

¹²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11页。

¹³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09页。

¹⁴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13页。

¹⁵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15页。

¹⁶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21页。

¹⁷ 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第025页。

读中，参照了满文译本（王西里精通满文），而满族文化则也和俄国文化一样，则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外的“化”外文化，所以，正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文化的“他者”。

四、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王西里的这部《纲要》所秉持的文学（史）观，与我们大不相同。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文学”的定义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这样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是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产物。上个世纪初，在经历了“白话文运动”、“小说界革命”以后的中国文学界，这种带有专业性质的“文学”概念，已经在我们现代汉语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而王西里《纲要》所秉持的文学（史）观，则与尚未经过现代化洗礼的晚清文人心目中的文学观相吻合。《纲要》的这一特点，我们仅凭对其目录略做扫描，即可见其大概。在《纲要》全部十四章中，实际上只有两章部分地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关。即涉及《诗经》的第四章：“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孔子及其实际贡献·三部最古老的儒家文献：《诗经》（中国精神发展的基础）、《春秋》、《论语》”和第十四章：《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王西里心目中所谓中国的“雅”文学，其实即科举应试文、议论、札记、谕旨、墓志、悼文等文言文。因此，可以推断：王西里这部世界上第一部用外文写作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实际上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点是不相吻合的。事实上，“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是这部“纲要”无以问津的。

王西里的这样一种“文学”观，反映了他那个时代中国旧的文学观。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即“文献”。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文献”即“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这种意义在英文中也有：Literature: The books and articles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of the literature relating to it.同样，俄文的 литература 也有同样的本义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акой-н отрасли знания, по какому-н специальному вопросу.

和各国一样，我国的上古文献也是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从一般文化和文献中分化和独立出来，在我国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事。近几年在大陆出版的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其体例和王西里的《纲要》倒有几分相似。例如《尚书》（王西里写作《书经》）、《春秋》二人都有所论列。同时，二人都未把《史记》列入，这很值得注意。

钱穆的《春秋》讲义，首先讲的就是著名的“春秋笔法”，即寓褒贬之义于一字。钱穆认为《春秋》的文字最有“文学意味”，开“我国修辞学”之先河，是“句斟字酌”的结果。而王西里也认为《春秋》善于以一字寓褒贬，尽管他认为这种“修辞”的起源是因为各地方言众多造成的，如“死”字，便有“卒”、“薨”、“崩”等诸多用词。钱穆认为：“西洋的散

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则以历史为大宗。”¹⁸和钱穆一样，王西里也深知《春秋》的价值在于“史”。“一言以蔽之，《春秋》不仅促进了其中所述史实的研究，而且也引发了对古代问题的研究”。¹⁹

在对古代文学的探讨中，王西里也注意到，《书经》（按即《尚书》）、《春秋》和《论语》等“经”的儒学化，是汉代以来发生的一次转向，是儒家的思想和观点，大规模地改变了史实。而且儒家还利用“史实”来创建道德原则和制度根本。²⁰在先秦时代，“儒学并非一个整体，而是分化成了若干部分，将其融为一体的是汉代的文人”。²¹在汉代公元135年，当朝宰相田蚡崇尚儒学，荐举儒生，其中包括讲授过《春秋》，同时也当过宰相的公孙弘入朝为官，遂使儒学成为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之学。

五、

如上所述，王西里的这部《纲要》，要按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称之为“中国文化史纲要”更确切。而之所以如此，推究起来，也还算情有可原。一者，王西里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不远万里，踏上中土，负有向俄国宫廷全面介绍中国各方面情况的使命，单纯的文学，自然难以限定他的视野。其二，在王西里那个时代，不仅俄国，就连王西里所研究的对象国中国，也还处于旧的文学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尚未生成，自然只能延续古已有之的传统观念了。

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文学就生活在文化的母腹中，文学与文化之间并未隔着千山万水，而实际上二者乃是一种“异质同构”现象，表面不同，实质相同。简言之，文学的意义，最终只能求助于文化来为其“最高审级”。在现代社会，要把文学从文化中分割出来，是不可能的。

《孝经》、《礼记》、《书经》三部经典的内容，构成了《纲要》第五章讨论的对象。《孝经》讲的是“家庭伦理”，即儒家所憧憬的社会的道德基础。《诗经》所宣扬的是“温柔敦厚”，同样也以维护家庭的稳固，发妻的地位为主旨。但关于儒家观念中家庭伦理最成熟的理论，见之于“孝经”。“孝”（почтительность）是“道德生活”（добрая жизнь,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的基础（“百善孝为先”）。以“孝”字节制人的行为，便需要有“礼”（церемония, ли）。正如《毛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礼”“是与生俱来之物，而非人为之外表或心性之渲染”。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都是非礼不行。王西里给予“礼”以充分的辩护。但中国旧礼教“杀人不见血”这一面，却是这位洋先生的认识盲区。他甚至为诸如“叩头”、“下跪”这样“有辱人格”的旧的繁文缛节也叫好辩护。

¹⁸ 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第022页。

¹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27页。

²⁰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47页。

²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33页。

还说什么“请不要忘记，中国拥有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人道精神，就是最民主的国家也未曾发出如此强烈而无忌的真理之声。没有哪个地方的小民能拥有对国家大事建言献策的自由。”²²

谈及《孝经》和礼仪，势必又会回到儒学这个主题上来。王西里当然也是以《论语》为据论儒学的。他声称儒学首先不是一种宗教（不讲身后事），也不探讨宇宙（宇宙论），而只讲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问题（伦常）。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后一个问题上，王西里指出：孔子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因为他在另一处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里似乎又间接肯定了“神”的存在。²³王西里的解释是：《论语》原本就是一部“由以往一些文集汇编而成”，因而反映了儒学各派的“纷争”，这似乎也不无道理。与此同时，《诗经》中则不但有（祖先的）神灵、鬼神，而且还不乏最高神祇——上帝——的在场：“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大雅·皇矣》）不但如此，《诗经》甚至透露了这样的“一线天机”，即尘世之王乃上天之王的“代言人”和代理的观念：“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诗经·大雅·文王》）

六、

《大学》乃《礼记》中“不完整的一篇”，表现了儒家的“执政意图”。²⁴但儒家“执政意图”表现最充分的，是《书经》即《尚书》。这是一部中国上古史。“但除了专有名字，根本没有史实”。实际上这是一本“统御之书”——王西里如是说。书中只有人名，而且“人名是用来对话”的。传说《尚书》有百篇，现存则仅五十八篇。亡佚的部分，是否就是关于这部编年史开始前的那“两千年历史”呢？因为无文献可征，故此只能存疑。王西里认为《尚书》成书的年代，是汉代。他的理由是：尧在禅位时竟然与大臣商量由谁继位的大事，这应该只能是儒家学者的附会。²⁵不但如此，他甚至认为《诗经》的“许多内容”也是“用来附会汉代之事”的。²⁶但证明《尚书》乃汉代所出之书的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是《禹贡》中所提到的“薄纸”，因为“纸”是在汉代才开始发明。王西里认为：《书经》“是一些人的道德政治经验的总结。”²⁷使王西里倍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那时的中国，即在西方传说中“诺亚”和“闪”的时代，中国对西方有多少认识？中国文化中有哪些来自西方的元素？但王西里认为中国的“儒家”不喜欢“西方”。王西里时代的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晚清，所以，也难怪他会有如此这般的印象。《书经》是儒家“治国之道和理想”的体现，而其别

²²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55页。

²³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57页。

²⁴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67页。

²⁵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71页。

²⁶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73页。

²⁷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77页。

名《尚书》实即“上好之书”之谓也。²⁸

王西里对《孟子》的赞誉可谓无以复加。他说一个国家应当以能拥有一部像《孟子》那样“的确出色、动人且富于魅力”的著作而骄傲。在王西里那个时代，有关《孟子》的作者，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王西里鉴于此书中往往以“谥号”称呼诸侯为由，认为孟子不可能“在同一时期见到所有这些人”²⁹，因而推断托名为“孟子”的，可能是“某位赋闲的思想家”，因而又可能系笔名。³⁰但时至今日，关于孟子的身份和身世，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前后。享年八十四岁。王西里还认为孟子固然属于儒家，但却是一个特殊的儒家学者。任何学说都会“表现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一方是保守分子，另一方是激进分子。他认为《书经》代表前者，而孟子则是后者的代表。他认为前者是（汉代）得势的儒家代表，而孟子则为失势的儒家之代表。当然尽管如此，孟子属于儒家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

王西里把《孟子》的主题概括为四条：人性本善，养浩然之气，民贵君轻及各家各派之观点。第一条很清楚，孟子主张“道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第二条“养浩然之气”，则在《孟子》文本中所在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公孙丑·章句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所谓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柔，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孟子·滕文公下》第二章）。第三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第十四章）“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第四章）最后一条——关于各家各派的看法。见于《孟子·滕文公下》第九章：“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闲先王之道，距杨墨、放淫词，邪说者不得作。”

如上所述，《孟子》一书俨然以孔子继承人自居，但他的观点和孔子也略有不同。王西里将此差异定义为进步和激进之差别。杨伯峻先生则把孔、孟之间的差异，归结为以下几点：1、孔、孟之论“天”内涵不同；2、孔子讲仁，而孟子则“仁义”并称，等等。

七、

王西里“纲要”的第七章：“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继续其在儒家理念统帅下介绍中国文学的路径。《易经》“入列”儒家经典系列“标志”儒家这种纯粹世俗学说“开始掺杂了”极端抽象的哲理色彩。³¹换言之，即一种形而下的话语，开始被形而上话语所掺杂。

²⁸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79页。

²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87页。

³⁰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189页。

³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217页。

该章讨论的主题是《易经》。《易经》最早的版本出自汉代的淮南子，西汉武帝叔父。之后，第一位将《易经》纳入儒学的王通出现了。尽管不乏异议，但《易经》仍然被当做“群经之首，大道之源”。³²王西里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易经》的注疏家们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家。此说确否，暂且存疑。但按照儒道把传统士大夫分为两家，这种做法究竟是否妥当，似乎也在存疑之列。例如，他说司马迁为道家人士，³³便是问题之一。《中庸》³⁴和《大学》一样，同样出自《礼记》。王西里说其语言“华丽庄重”。《礼记》是学生习作和哲学性评析。《中庸》则据传说出自曾子之弟子、孔子之孙子思之手，“旨在对自然界的形而上学原理和精神活动作出阐释”。《中庸》后来成为“登科及第和入仕做官”的必读之书。但在宋代（公元960-1268年）以前，儒家尚不成体系，宋代才首次尝试为儒学确立统一的原理和哲学体系。³⁵此时，佛道也开始兴盛，从而使儒学面临“先验主义思维”的挑战，而一种新的哲学思潮（性理）也就作为应战而应运而生了。而性理学的理论基础正是《大学》和《中庸》，它们备受理学家之青睐，被奉为启蒙之书。

但新学的遭遇很不平常。一开头就遭到迫害，直到宋朝末年才兴盛。到元朝由于忽必烈所重用的许衡，新学才彻底征服蒙古人。此后，理学从宋末发轫，一直延续到清朝，期间相继涌现出许多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司马光、程子、范仲淹、朱熹、李光地。王西里写到此处，提到此书业已译为德文，还讥讽“许多德国学者”“因出版该书而“攫取了荣誉”，但这种哲学其实是“荒诞的”。³⁶

本章下半部分，王西里慨叹可以列入儒家经典的书籍浩如烟海，难以一一尽述，只能点到为止地做个豆腐账而已。由于此类书已经远远超出“文学”范畴，故此不列。同样，王西里关于道家和佛教的有关章节，距离文学也很远。实话说，从文学角度出发，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涉及道家和佛家，本意无可厚非。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学的立场出发，探讨一下中国文学著作（诗歌和散文）中，是如何渐进式地渗透了儒、释、道三家哲学理念、人生抱负和人生理想的。这实际是既以文学为出发点，又以文学为旨归的现代人的常规写法。但是，在对历史著作进行研究时，一定不能忘记其时代背景。我们不能对王西里提出一些不符合时代和历史条件的苛责。况且，在王西里那个时代，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不但中国没有，在整个世界上也暂付阙如。

与泛泛的“道家”、“佛教”比，倒是历史与文学关系更近一些。“中国的散文则以历史为大宗，因为中国向来以史当作文学看”。³⁷王西里也同样认为，在中国，“占第一位的是史学”。司马迁的《史记》当然是中国最伟大的史学著作之一，但关于这部著作，历来有一种鲜明的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王西里认为史学是“中国教育的基础”。

³² [明]黄俊（撰）：《周易通略》，同上，第219页。

³³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221页。

³⁴ 中庸（непременная середина）这种译法如果不是王西里自定的，便是他那个时代的通译名。于今可以见到另一种译法——золотая середина。

³⁵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223页。

³⁶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229页。

³⁷ 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第022页。

“史学并非儒家的特权，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表现出了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学习的渴望。这就是并非儒生的司马迁成了第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原因。”他更倾向于当时还仅仅是一个学派的道家。这里，断言司马迁不属于儒家而属于道家，这种说法未免孟浪。据我们对我国历史的粗浅认知，似乎还没有人有过类似说法。“司马迁通常被称为中国的希罗多德和中国史学之父。”³⁸王西里在把司马迁与希罗多德相比的同时，又指出二者之间的不同：希罗多德的著作是“完整的叙述，史实环环相扣，上下呼应”，而司马迁的“史实分述方法”却不无奇怪之处，他说司马迁“按照某人参与历史事件时的官阶而为该事件分配位置，因此，要想获得对某一史实的全面认识，必须综合各种章节中的相关内容。”《史记》按体裁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但是，出于对文学的关切，我们认为，王西里对《史记》的另一面，即“无韵之离骚”这一面，却未能给予充分揭示。《史记》和《庄子》一样，一方面是史学和哲学，另一方面，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学绝唱。

的确，在王西里这部名为“中国文学史纲要”的著作里，留给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空间，其实十分有限。严格地说，在其全部十四章中，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只有区区两章的篇幅，其余的70%的文字，和文学无关，或只有间接关系。这唯一正面涉及文学的两章是本书最后的两章，即“中国人的雅文学”、“俗文学、戏剧及中长篇小说”。

何谓“雅文学”？而且，如王西里所言，研究这种文学竟然“需要专心致志，倾尽一生之力”。³⁹王西里笔下之“雅文学”，似乎与我们所谓“文章”意义相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中国人的“文章”与现代意义上的“美文”无丝毫共同之处，而是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经时济世，“文以载道”。“文章”更是千百年来儒生（或曰士大夫）实现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伟大抱负的工具。

如此一来，则王西里心目中之“雅文学”，所指为何，读者想必也已经猜到了。是的，是指科举考试应试文。过去的儒生终其一生青灯古卷，为这区区500到700字的文章苦心孤诣，白首穷经，叹为观止。应试的举子必须牢记题目（多出自经书）的出典和疏义以及他人的论点，“还要牢记四书五经的全部断篇残章和格言警句”。⁴⁰当然，在王西里心目中，属于雅文学范畴的，不是唯有科举文，还包括中国传统的“散文”——议论、札记、谕旨、墓志、悼文等。此类文章自汉代以来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

王西里也承认：尽管俄国自普希金以来，出现过诸多著名诗人，但“中国在两千年间诗人层出不穷，达数千人之众”。⁴¹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诗文”，赋也蒙王西里予以特别关注。但整体而言，对于中国的诗歌及其宏伟壮阔的历史，王西里的“纲要”仍然只是仅仅揭开了一道序幕而已。民国以来，中国经历了“小说界革命”，文学“场”的大格局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前被奉为“正统”、正宗、中心的“雅文学”，回归其实用文的本质而被逐

³⁸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255页。

³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303页。

⁴⁰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305页。

⁴¹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311页。

出了“纯文学”的场域，而前次难登大雅之堂的瓦舍勾栏的说书体话本，与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碰撞而产生的小说，成为文学界的新宠和正宗，从边缘移至中心，成为现代文学中首屈一指的重要门类。与此同时，旧体诗（诗词歌赋）在经历过“白话文运动”以来，随着新体诗（自由诗）的崛起，也成为一种“绝学”，渐渐因受众的减少而沦为边缘，而新体自由体白话诗成为主流。而这些，当然都是当时的王西里所未之见的。

但在王西里之后，俄国汉学界对于中国诗歌的研究，却成为一泱泱大国。仅就笔者听闻：俄罗斯一直都有专门研究汉魏六朝诗歌、隋唐、宋元、明清诗歌，研究陶渊明、王勃、李白、杜甫、苏轼等诗人的大家。仅就笔者手头这本伊·谢·斯米尔诺夫这部《中国诗歌》⁴²而论，即堪称其中一部皇皇巨著。此书 633 页。由序言（无言之语）和 5 章构成，每章各有一篇导论，下分若干节。5 章的题目是：第一章：古典诗歌渊源及其衰落；第二章：悟出诗韵之意；第三章：文选、选集、别裁、诗选；第四章：序跋及其他文艺评论方式；第五章：翻译初探。附录除导论与各章外，还附有介绍王西里、塔斯金、李福清、艾德琳、阿列克谢耶夫等俄罗斯著名汉学家的文章（论文和回忆录）。仅此一例，就足以概见当今俄罗斯汉学界在汉语诗歌研究领域里，已经达到何等巨大的规模。然而，“饮水思源”，当今俄罗斯汉学仍然永远不会忘记首次将中国文学史介绍给俄国的打井人——王西里。

八、

王西里的这本“纲要”，就最后一章的题目而言，总算是回到“正题”上来了。“我们终于讲到这种在我国最称得上是雅文学的文学类别了”。看来，在对“文学”的理解上，中俄是有些错位的：王西里认为他所谓“俗文学”，在俄国却属于“雅文学”的范畴，而且，他认为这种在俄国可以受到尊崇的文类，在中国却受到“中国人的完全蔑视”。⁴³“小说家言”在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里，的确曾经属于“姑妄言之”的稗官野史。中国传统文人确实不屑于甚至耻于从事这种“小道”，因为“文章经国之大业”。

俗文学和戏园子说书这种活动，在中国历来是平民百姓、三教九流的“家常菜”，隶属于官方文化的士大夫们，是不屑一顾的。但在被官方文化忽略了民间和乡下，这种活动由于受众广泛而俨然成为与官方对立的文化大国。关于“戏园子”在民间活动的盛况，王西里自述，他当年在北京时，就有十三座戏园子，戏班子则多达一百五十来个。

官方文化受儒学的控制很严。而儒学虽非宗教，但却“禁锢一个民族”达两千年之久！⁴⁴王西里指出：其实中国民间的戏剧活动，与中国的历史一样长久，早在《诗经》中，就有“哑剧舞蹈”，《论语》也提到过戏剧活动。《诗经》中的“载驂”、“载驷”、“駉駉”，都和原始舞蹈有关。以上所说的戏剧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原始时代的祭祀仪式，还算不上戏曲。戏曲

⁴² И.С. Смир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заметках, переводах, толкованиях, Москва, 2014 г.

⁴³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313页。

⁴⁴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年，第315页。

直到隋末和唐代才出现。唐玄宗（公元 720 年）时西域音乐和歌曲传入大唐，王西里由此推断中国的戏曲活动肇始于隋末。

王西里认为中国的中长篇小说来自于中篇小说，而中篇小说则又发轫于传奇，长篇小说体裁的成型与来自西域的一定影响有关。（这里也许是说《西游记》和《大唐玄奘西行记》？）在说到中国文化善于同化外来文化这一特点时，王西里有一段插话，他说：……中国人不是简单地模仿者。“这个民族的独立精神至今未失，总是以自己的眼光审视一切陌生和外来事物，并按自己的观念改造一切。”⁴⁵所以，在中国无论戏曲还是长篇小说，都打上了中国风格和世界观的烙印。

中国戏曲中最著名的《西厢记》，在王西里写作此书的时代，已经有一位叫儒莲的翻译的俄文译本。就剧本和唱段而言，即使在欧洲也“难以找到这么多精美的剧作”。⁴⁶但当时的王西里还可以借助欧洲人的译著来认识中国戏剧。他在“纲要”中简述其内容的《梅香》和《合汗衫》，便都出自巴赞所译《中国戏剧》。

中国的小说（如以传奇而论）则公元前即已发端，刘向的《列仙传》就是。四世纪时，有《搜神记》，宋代叫《太平广记》。最好的当然是志怪小说《聊斋志异》。王西里在其所编《中国文选》第一卷中，收录了《聊斋志异》中包括《罗刹海市》在内的 5 篇小说。在此类故事中，由狐狸变成的小美人往往与人发生异常轰轰烈烈的爱情，而在伊索寓言和世界神话传说中，狐狸却大都是单纯的偷鸡贼而已。

我国最著名的四部长篇小说，除了上文未曾点名地提到的《西游记》外，“对于“写绿林强盗”的《水浒传》，王西里也只是一笔带过，但他对《红楼梦》却赞誉有加，称其为中国“最好的小说。”⁴⁷在对小说情节做了一番概述以后，王西里指出写于一个世纪前的这部小说，对于人们理解那个时代中国封建时代上层社会生活良有助益。他还赞扬《红楼梦》的语言“纯净雅致”，指出《红楼梦》刊行以来“洛阳纸贵”的盛况，以致为其“狗尾续貂”者层出不穷。

王西里说在中国人眼里，《金瓶梅》是最“伤风败俗”的小说。小说的名称来自于小说中三位女主角——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王西里认为这是一部暴露小说，暴露了社会生活肉欲横流下流龌龊的一面。王西里用了长达两页的篇幅叙述了故事梗概。他认为在中国，还有比《金瓶梅》更淫秽的小说，如《品花宝鉴》。他认为要认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及其生活观，长篇小说是比戏剧更好的教材，因为它能使我们更加完整地认识生活，尤其是生活的细节方面。关于中国的历史小说，他提到的有《开辟演义》、《东周列国志》、《七国演义》和《战国》等。

王西里此书似乎未能写完，尽管大体轮廓已经清晰，只剩下最后一个句号了。结语部分他再次发出浩叹：中国文学，浩如烟海，以一己之力，欲穷汪洋大海，谈何容易。更何况，

⁴⁵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 年，第 317 页。

⁴⁶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 年，第 319 页。

⁴⁷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圣彼得堡，2013 年，第 321 页。

他一生研究的对象，也非以文学为限。凡此种种，似在告诉我们他的种种不易。今天，拜读这位俄国学者 100 多年前的墨迹，仍然令人感触万端。方今之世，世界范围内汉学已经成为泱泱大国，俄罗斯自然也概莫能外。这个领域里大师云集，光彩夺目。今天的汉学家所能占有和利用的资源，更非昔日的王西里所能比，但是，我们却难以忘记王西里在中国文学史海外撰写方面的开创之功。

俄罗斯汉学会永远缅怀这位先驱者的名字的。